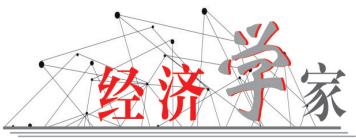


稳住经济基本盘



王 东 京

“稳中求进”是中央确定的工作总基调，所谓“稳”，是指稳住“经济基本盘”。何为“经济基本盘”？从经济学角度讲，其实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适度增长。若将这四大目标进一步分解，则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对“四大目标”与“六稳”的关系，若倒转过来也许更容易理解：稳就业，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稳金融，是为了稳物价；稳外贸、稳外资，旨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而稳投资、稳预期，则是为了稳增长。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对政府调控有四大目标并无异议。大家的分歧在于，以上四大目标应该如何排序？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产生过争论。凯恩斯学派主张“增长优先”，货币学派却主张“稳定物价优先”。10多年前，国内也有学者主张优先“促进经济增长”。2018年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表面看，以上只是目标排序不同，无碍大局。可问题是调控目标的排序不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点与着力点也会大为不同。

从操作层面上讲，对政府调控目标排序，首先需要确定排序“规则”。只要规则确定了，排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那么应该用什么作为排序规则呢？我的观点，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邓小平曾有一句名言：

“稳定压倒一切”。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的也是以“稳”为前提。由此说，政府调控目标应将“稳定”作为排序的规则。

前面说过，学界关于政府调控目标排序，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若按“稳定规则”排序，“充分就业”理所当然应排在“稳定物价”之前。通胀发生后，虽然人们的实际收入会下降，但损失最大的却是高收入者。可失业不同，失业者大多是低收入者，一旦出现大面积失业，势必会危及社会稳定。

同样道理，“稳定物价”应该排在“经济增长”之前。经验表明，若将“经济增长”排在“稳定物价”的前面，政府通常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大水漫灌，结果必引发通胀，而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个国家失去稳定，经济也就不可能持续增长。正因如此，所以中央提出“六稳”首先是稳就业；其次是稳金融（物价）；再次是稳外贸、外资（国际收支）；最后才是稳投资和预期（增长）。

有一种看法需要澄清：人们主张“增长”优先，据说理由是“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显然，这是混淆了“增长”与“发展”的区别。在经济学里，增长是指GDP总量增加，而发展则是指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曾对此作过形象的解释：增长是指人的身体长高，发展是指人的素质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的最好诠释。

由此可见，中央提出“六稳”，是根据“稳定规则”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也是经济基本盘。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必须优先保就业和民生。为此，就得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这

是说，要保就业和民生，当务之急是保市场主体，而重点则是要保中小企业。

无须讳言，目前中小企业确实面临诸多困难。受疫情影响是一方面，税费偏重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经营成本偏高以及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为帮助企业降成本，国务院今年推出一系列举措。如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

为解决融资难问题，国务院今年相继出台了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持续增加首贷户，推广随借随还贷款。要求大型商业银行今年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并适当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与此同时，还强调优化利率监管，进一步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引导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要稳中有降。

以上举措，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我举双手赞成。不过，对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却想作一点补充。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责任在银行，是银行嫌贫爱富。而银行却说，不给中小微企业贷款，主要是企业没有资产抵押。是的，银行信贷资金来自储户，当然要对储户负责。试想，若企业无资产抵押，日后银行贷款收不回怎么办？

困难就在这里：银行希望贷款安全，而中小企业却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这个困局怎样破解？政府现行的办法，是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无还本续贷。可这些措施只是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而未保证银行的信贷安全。我想到的办法，是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之忧。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为新时代成渝地区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打开了新空间。一年多来，这一战略在川渝两地火热实践，步入加快成势见效的新阶段。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促进和落实“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奋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深度广度拓展，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以战略叠加实施为契机， 夯实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动力支撑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国家在不同时期赋予成渝地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都各有差异，并呈现出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的动态轨迹。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位优势。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紧扣重庆和成都两个重要枢纽。一方面着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将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结点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发挥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增强对通道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西部陆海新通道正不断建设成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以及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随着西部地区逐渐形成通道有效支撑、战略有机衔接、南北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运输通道建设和物流设施建设将纵深推进，东南西北双向开放的叠加效应将得以更充分发挥。

长江经济带建设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潜能。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11省市，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且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经济带。基于“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长江经济带确立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其中，重庆是长江经济带“一轴”的三大轴点之一，成渝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三极”的三大增长极之一。随着长江经济带不断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将更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激发出强劲的转型动能和发展潜能。

“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放层级。“一带一路”建设中明确要求打造西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和“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将重庆打造为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将成都打造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全力打造“中欧班列”品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继续深入，将更好提升成渝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厚植经济腹地优势、增强内陆门户功能，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放层次。

以五大战略协同为抓手，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关键在协同。川渝两省市应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树牢一体化理念，把“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作为最大公约数，整体推动强核与优圈、织网与塑轴、赋能与兴业、绿底与宜居、重教与引才“五大协同”。

协同抓好“强核与优圈”。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经济向重庆和成都这两个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明显。2020年，重庆主城区和成都经济总量分别占两省市的39.4%、36.5%。这意味着抓好了“双核”，就抓住了成渝地区发展的“压舱石”和“基本盘”。因此，要大力协同提升“双核”的综合能级和国际竞争力，围绕智慧城市和公园城市建设、协同推进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等，打造更具竞争优势的区域发展极。在强化“双核”引领的同时，高度重视各经济圈之间以及经济圈内部的优化提升。一方面，大力推进重庆西扩和成都东进，密切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之间的交通经济联系、产业相融互动。另一方面，在经济圈内部积极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在规划编制、功能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强统筹协调，率先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协同抓好“织网与塑轴”。充分把握好交通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与促进产业分工布局、人口迁徙流动的内在联系，既可以提高交通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投资效率，又可以沿主干交通线形成重要发展轴，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川渝两省市将织密织优现代交通网、公共服务网与共建主要经济轴带紧密衔接，促进交通、产业、人口的协调布局。一方面，全域提升内联外通水平，在继续推进枢纽机场和高铁、高速等主干网建设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提升通达集散能力。另一方面，顺应交通格局变化重塑，做强主要发展轴带，在基础好、人口多、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区推动试点，打通“断头路”，构建跨界快速通道，拓展延伸沿江发展轴带，打造南向开放门户和枢纽。

协同抓好“赋能与兴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把全面挖掘增长动力源与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紧密衔接，把科技创新力、文化熔铸力、

□ 武陵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质量建设

数字融合力全面系统、协同集成作用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有效提升成渝地区综合竞争力。注重把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协同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并实现两地共享，争取国家科技研发平台、产业转化项目布局。注重把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打造深植巴蜀文化沃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特色产业。注重把数字赋能产业发展，共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推动数字产业链式聚集和联动发展，牵引带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协同抓好“重教与引才”。成渝地区要在未来占据全国发展制高点，务必在教育和人才上超前谋划、先行先试。一方面，鼓励川渝高校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设网络化、平台式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培养更多复合型、跨学科的人才。另一方面，构建吸纳有创新精神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机制，在给予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扶持、支持校地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等方面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举措。争取在开辟海外引进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实现工作许可、签证与居留有机衔接等方面有更大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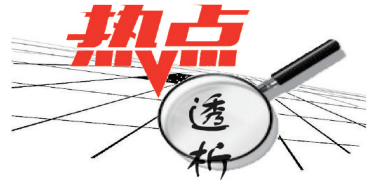
协同抓好“绿底与宜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必然是绿色美丽的经济圈。一方面，成渝地区应着眼“山、水、城”三大空间担当起“上游责任”，着力构建“绿水”廊道，推进区域内长江、嘉陵江、岷江、沱江等生态廊道建设，强化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着力构建“青山”隔离带，依托龙泉山、华蓥山、秦巴山区、川中丘陵等山系山体构建环绕城市的生态隔离带；着力构建“翠城”共治体，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管控，完善跨界污染协同治理和联防联控机制。另一方面，以绿为底，共建宜居宜业居所典范，突出城乡差异化建设，让城有城的特征、乡有乡的风貌，倾力打造“等质不同态”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强镇、美丽休闲乡村，提升生态功能和产业功能，真正使乡村成为记得住乡愁的心安之所。

以建立高效工作体系为保障， 凝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最根本的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勇担当、善作为，着力形成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的好势头，确保国家战略在巴蜀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用系统思维做好统筹协调。把握好慢与快的关系，既保持历史耐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推进工作，又对已决定的事项时不我待、真抓实干，竭力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把握好合与分的关系，既加强协同配合，及时解决跨区域、跨领域、跨部门重大问题，又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力促各单位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把握好行与知的关系，既对党中央有明确要求、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事项逐项抓好贯彻落实，又对重大问题及时研究、明确方案、落地见效。

以好的方法确保好的效果。强化改革推动，加快改革举措集中落实、率先突破、系统集成，建立健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标准、统计和评价体系。强化法治理念，加快建立成渝地区地方立法和执法工作协同常态化机制，以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为重点，推动联合立法，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强化市场思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引导动员更多企业有所作为、积极作为。



让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 袁维海

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以高质量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国家命运所系，是世界大势所趋，是发展形势所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这需要以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有效激发并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让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科技自立自强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被人“卡脖子”，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是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特别是冷门学科、“无人区”领域的长期稳定支持；充分尊重科学规律，调整优化考核指挥棒，允许“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二是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窘境，就要从国家急需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集合精锐力量协同攻坚，聚焦“断卡堵点”把短板补齐，聚焦优势领域把长板拉长，有效解决“燃眉之急”和“心腹之患”。

三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不光体现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更体现于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上的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重点是解决“卡脖子”短板问题，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攻关，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重点是依托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提升和原创成果，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同时，激

活与之配套的金融链、服务链、人才链，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进一步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发挥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以改革新突破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紧密围绕关键环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又依靠有效市场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全国统一的科技攻关协调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统筹整合优秀力量，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进行跨学科、跨行业、观点融合、技术互补的攻关合作，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二是拿出更大的勇气推动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搭建平台、搞好服务上来。强化规划政策引导，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形成公平竞争环境和政策激励机制。在财政科技资源配置和项目布局上，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集众人之智、听取企业意见，更多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选择作用。

三是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但是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还应当是组织主体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离市场最近，最了解市场需求，创新动力最强。大力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重大创新联合体，发挥市场需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的优势，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战略性组合，将二者优势结合在一起，协同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充分释放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